

中生代
思想书系

历史、身体、国家

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

黄金麟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历史、身体、国家

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

黄金麟

著

中生代
思想书系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黄金麟著.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8

ISBN 7-80148-882-2

I.历... II.黄... III.中国—近代史—研究—1895~1937

IV.K2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3892 号

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

黄金麟 / 著

责任编辑:刘刚

装帧设计:林涛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刚

社址: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邮政信箱:北京市东四邮局 7 号信箱 100010

电话:010-65270477

传真:010-65270449

销售热线:010-65512133

E-mail: newstar_publisher@163.com

印刷: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本:960 × 1 300 1/32

印张:8.25 字数:210 千

版次:2006 年 8 月第一版 2006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 001~5 000

定价:24.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自序

这本书所以以“历史、身体、国家”作为标题，并将身体夹放在“历史”与“国家”之间，并不是一个任意的选择。这个排列组合相当程度反映身体在 20 世纪初叶的中国的存在景况。这种前有特定历史结构的束限，后有国家需求的赋加，正是身体在当时所遭遇的两重羁绊。这个特定的历史格局和其所具有的结构性限制，是我们在观察近代中国的身体生成时，不能忽略的部分。这本书的写作基本上是想回答三个简单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的身体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历史变化，才有现今的样子？这种身体的发展状态隐含了什么样的历史特定性与危险性？它能否被当成是一种普遍的、永恒的身体模式来看待？对这些问题的质疑与回答，构成了本书的基本论调。虽然书中所谈的历史阶段离现今已有一段距离，但许多书中提及的问题与现象，对现今的身体发展仍具有一定的诊断作用。这种兼及历史研究与文化批判的工作，是我想透过这本书一并完成的工作。

在讨论这个攸关近代身体生成的关键时程时，我的内心一直有着一个冲突性(ambivalent)的思虑存在。我想这是大部分研究和反省现代性(modernity)的学者都容易有的心理情结。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现代性的发展和输入(特别就中国而言)，的确让身体经历了某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与“快乐”，让身体得以摆脱传统伦理与秩序的专断统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纪元。但是在做这

样的论证与赞许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现代性和其所产生的认知框架已经变成一个类似库恩(Thomas S. Kuhn)所说的典范性思维,主导着身体发展和价值评量。这种认知形势和其所包含的潜在危险,从20世纪初叶后就逐步在侵吞着中国人的身体。这种无意识的身体发展形式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任何递减的迹象,它依旧潜藏在身体的背后,限制着身体发展可能性。这种典范化发展和它所意含的局限,在以后现代的视角来检视时,特别显得突兀。在无意暗示后现代就是一种出路的前提下(我还没有看到这种可能性),我希望本书的讨论能使读者重新思考“身体的存在究竟应该如何被看待”的这个问题,使身体的国家化与工具化发展,这两个隐而不显但却持续侵蚀身体发展趋势,获得某种的超脱。本书对于现代性身体的质疑或许还不够周延完整,这个不足只能以更多的深思、研究和努力来补足,我希望自己的未来研究能对这个缺失有更多的补足。

过去三年来,这本书的写作和修改几乎占去我教学之余的大部分时间。没有东海的幽静与自由,以及社会学系的良好研究环境和同仁鼓励,这本书将无法在这么有限的时间内顺利完成。这个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它所给予我的幽静、自在与舒适,是本书得以问世的重要原因。我感谢林松龄教授在过去六年中所给予我的持续鼓励。虽然斯人已远,但戚念的情份没有因此而稍减。“国科会”在过去几年来对我的研究计划的持续赞助,让我能够心无旁骛地优游于社会学和史学的浩瀚领域,探讨一些有趣的课题,也是我衷心感谢的。本书的第二章和第五章曾分别在1999年的社会学年会与“间别千年:临界空间与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做过口头发表,与会学者的建议与鼓励以及评论人的批评,均令我受惠甚多,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除此之外,我也要感谢丘为君、沈松侨和蔡笃坚几位对本书部分章节内容的批评与资料提供。“身体史学”与“身体/政治”课程学生金世康、谢雨絮、叶于婷、李孟汉、蔡文腾、廖旋妙、陈淑真、施

嫦芬、杨宗瀚、许世一、刘慧璇、陈惠萍、许裕昌、许絮岚和沈佩仪等人阅读讨论了书中大部分章节,也让我受惠甚多。参与这个研究计划的助理唐珮珍、林庭瑶、许絮岚、许裕昌和林铭溢,也是我要感谢的对象,没有他们的费心与投入搜寻资料,这本书将无法以现有的面貌呈现在读者眼前。联经的编辑委员会对本书部分内容的中肯批评与建议,张运宗先生的协助排版与制作索引,以及林载爵总编辑的慨然协助出版、安排评审与效率配合,也是我要衷心致谢的。

我的家人对我的长期支持是撰写这本书不可或缺的要件。虽然我母亲没有机会看到这本书的出版,我还是要在这一这里感谢她一生的照顾与抚养,并将这本书的完成归功于她的努力与付出。安婕的出生让我在忙碌中享受着许多初为人父的喜悦;咸惠的费心照料家务与精神支持,权充所有初稿的审查者,更是我必须深切感谢的对象。本书的出版虽然有这些人的协助,但他们都不应该为书中的任何可能错误负责,这个责任应该由作者个人来负担。

黄金麟

2000年初夏

于台中大度山

目次

自序	1
第一章 身体与政治	1
为何是身体?	1
身体的社会学思索	8
近代中国的身体发展与身体研究	16
第二章 军国民、新民与公民的身体——身体的国家化生成	27
“模范生”的言说生产	27
改造人作为改造一切的基础	36
军国民、新民与公民的思想牵演	45
格式化的身体规训	79
结论	86
第三章 礼法斗争下的中国身体——法权身体的诞生	89
刑律与身体	89
旧律与身体	93
身体的法权化	102
礼法之争：一场身体的从属战争	113
民法上的“人”与身体	128
结论	138

第四章 钟点时间与身体	143
身体与时间	143
世界时间的采纳	150
钟点时间的兴起	160
身体的时间化与钟点计值	165
教化性身体与时间	176
结论	186
第五章 游移的身体与空间的身体建构	188
空间与身体	188
“示威”：身体的空间展演	195
法权与时间的空间实践	213
空间的挪用与身体行动	220
结论	228
第六章 身体的去从	230
参考文献	238

第一章 身体与政治

为何是身体？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格局里，身体的存在究竟处在一种怎样的景况，这个问题一直未有清楚的阐释。对许多研究近代中国史的学者而言，身体的存在是一个事实，但碍于各种条件的阻滞，这个议题一直没有成为他们着墨考究的对象。这种轻忽和低估或许并不能归咎于任何学者的偷懒，而是因为长期以来学界已经习惯以一些既有的典范来思考和观察问题。这种偏好虽然可以使我们对某些已经发生的事件、重要的个人、主流的思想或区域化的政经发展有熟稔的了解，但它也使得我们无法再以一种新鲜的角度来观照世界的变化以及人在其间所经历的种种命运变化。身体在汉学或中国研究领域中的低度显影，甚至处在一种存而不论、视而不见的状态，和这种既定思考的框限有一定的关联。虽然这种长期的轻忽最近已经随着女性主义、性别研究、医疗史和儒道身体观等的探讨而有些微的改善，但是，系统性的讨论和规模性的反思仍处在萌芽的阶段。

当然，在做这番反省与检讨的同时，我们也不必过于苛责汉学界或中国研究领域学者的学术定见与偏执，因为这种“蔽于人”或“蔽于己”的学术思考习惯并不为我们所专有，而是一个遍及中西

方学术界的普遍毛病〔1〕。艾坡比(Joyce Appleby)等学者对出现于18世纪后的英雄主义科学原则的批评,以及这种科学思考所隐含的绝对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弊病的检讨,就清楚说明这个源于18世纪的科学革命对后世学术发展所造成的严重影响〔2〕。以身体这个议题的探讨而言,西方学术界也是到1980年代初期才因为女性主义运动的高涨、资本主义消费文化对身体的攻占、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焦虑以及福柯(Michel Foucault)对遍布人身周遭的“生命权力”(bio-power)的揭露与批判,而开始对此问题有所觉醒。然而,在整个中国研究的领域中,特别在中文书写的世界里,这个问题却还是处在一个相对低度开发的境域里。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过去的认知积习依旧主宰着整个学术研究领域,这个状态使身体研究迟迟无法成为一个检视历史走向和观察人身价值的着力焦点。

研究身体在近代中国的演变具有以下三个意义。首先,以身体的生成来观看历史的演变,可以让我们对许多已经发生的史事或史实有一个不同的考察切入点,让原来以王朝、政治、经济或社会阶级等作为聚焦的分析,改为以身体作为考究的出发点〔3〕。这个观察除了可以让我们对过往的史实有更多面的认识外,也可以让我们对许多过去视为零散、索然甚至不相关的史事,有一份新的

〔1〕 这个“蔽于人”或“蔽于己”的说法,是改写自戴东原的“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两句话。梁启超的诠释,“盖学问之难也,粗涉其涂,未有不为人蔽者;及其稍深入力求自脱于人蔽,而已旋自蔽矣”,清楚说明其间分寸拿捏的不易。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第58页。

〔2〕 见Joyce Appleby, Lynn Hunt, Margaret Jacob, *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 (N. Y.: W. W. Norton, 1994)对英雄主义科学原则的反省与讨论。

〔3〕 “身体生成”这个概念指称的并不是一种身体的生物性诞生或创造,而是指称一种在肉体既存的情况下所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或文化模造。这种社会加诸自然条件上,从而产生的身体改变,是身体生成这个概念想要凸示的景况。这个概念的指涉也适用于以下各章的讨论。

体察和警惕,警醒到其间可能存在的连续发展。除了这个层面的显露外,以一个历史的角度来思索身体的生成,也可以让我们对出现于1980年代后的各种身体议论,特别是有关身体的类型学分析,以及那种以西方身体发展为参考对象所形成的身体理论,有一个反省检视的机会。这种透过历史讨论以检讨理论思维的做法,也能让我们在审视理论发展之余,对中国身体生成的特殊性有所照顾。本研究将证示,这些理论性的划分和区辨容或具有启发思考的功能,但在面对具体的历史现象时,它们的脆弱和简化以及隐含在其中的以欧洲为中心(eurocentric)的趋向,将立刻显露无遗。在中西方各具有特定的历史发展轨迹的前提下,我们必须小心,避免以西方的历史经验和建立在这种经验上的身体理论来直接解释中国的身体生成。这种理论和概念的暴虐运用是应该谨慎避免的。如何营造一个切合、有趣、有对话的讨论,同时避免一种“义和团式”的反外情结,是我们必须慎重对待的问题。最后,研究身体在近代中国的生成也可以让我们对自身的存在有一个不算全新但却更深入的了解。这个“认识自己”的目的是我所以会对此问题着迷,甚至有着强烈探求动机的原因。我希望透过这个讨论来澄清,身体的存在和意义是怎样在近代中国的历史演变中,因随着国族命运的更动而被积淀、型塑出来的?这个有着特定历史背景的身体发展形式,最后怎样变成一个普遍、共通的身体开发形式,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

虽然这本书里面讨论的问题都是清末民初时期发生的一些史事,但这些攸关身体生成的重要过程和面向却是决定往后数十年甚至百年中国身体发展的主要力道所在。以当代身体所具有的国家化、法权化、时间化和空间化发展而言,这四个本书着力探讨的面向,其实早在百年前就已经走上现今发展的道路。因此,本书的撰写,除了是希望对这一段历史发展有一个客观的陈述外,也期望透过时间的拉长而对自己的存在和其所以然,有一个更清楚的理解。当然,这样的声称并没有否定台湾在经过日本五十年的统治

后,已经产生一个和中国本土不同的身体发展历程,甚至在 1949 年之后产生一种后殖民论述所谓的“混血”的新身体经验。不过由于国民政府的迁徙台湾,甚至搬置许多民国初期的身体论述和制度来统治台湾,因此本书所谈的内容对许多生活于台湾的人也具有一定的认识自我作用。

当然,身体的存在并不始自清末民初时期。我之所以选定清末民初作为身体研究的起点,主要是因为这一时期中国所面临的困顿局势,以及因此困顿而产生的许多改革措施,如由清政府推动的自强运动,变法、修律和教育改造运动,以及由民间知识分子所发动的军国民、新民、新文化和公民运动等,都和身体的打造或再造有着直接的关联。甚至以爱国作为名义的各种学生运动,也都对近代身体的型塑和使命化产生一定的强化作用。这些密集、接续开展的活动,它们的形成和出发动机或许并不一致,有些甚至也不是以身体的生成作为独立的诉求,但在结果上却都对身体的改造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些出现在论述上和制度改造层面上的变化,使身体出现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改变。这些一波波的改革措施,虽然没有全部去除儒、墨、道、法等传统思维对身体形成的拘系,却使得它们的议论快速沦为一种边缘论述(marginal discourses),不再掌握有型塑和指导身体作为的主导地位。这些重大的变化说明,如果我们要了解近代中国身体的生成,以及所以产生这种重大变化的原因,对清末民初历史的看重,特别是以身体的生成作为切入角度,重新审视这一段的历史发展,是一个不可少的工作。

虽然本书无意于以一种巨细靡遗的考证工夫,或一种编年纂述的形式,来检讨身体在近代中国所经历的巨大变化,但清楚交代身体的意涵,以及本书侧重的分析面向却是必要的。就身体的生成而言,它自然包括一个生物性的存有以及一个文化性的成分在内。这种自然与文化的交杂混合是所有古今身体都具有的共通特质,也是它所以不易被限定化或单一化呈显的主要原因。这种看

法几乎是所有研究身体的学者都共同持有的基本立场〔1〕。因为当身体的生成不单牵涉一个生物性的存在,还牵涉文化性的区辨和认定时,各种政治和社会的任意就可能渗入身体的建构过程中,使它成为一个无始无终的生成过程。这种不确定、成为(becoming)某种状态的发展流程,广泛出现在各种身体的生产过程中。而也在这个身体是一个未完成(unfinished)的发展过程上,我们看到各式各样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教育和公共卫生的力量,正试图透过它们所能掌握的细微管道,在肉体已然存在的前提下,主宰或影响身体的建构过程。这种多种力量同时作用在个体身上的发展局势,可以在不同的个人、性别、族裔、身份团体或阶级的层次上观看出来。然而,在做这般的考量时,我们也必须留意,这其间并没有一个惟一、独大的主宰力量,或一个像马克思主义者所声称的归根结底(in the last instance)都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在统合着各式身体的生成。作为一种生物和文化交融的产物,身体的发展一直受制于时间、空间和各种力量交加、互制的影响,其间并没有哪个力量永远超越和主宰其他力量的问题。

在强调了身体的可能变易,以及这种变易和身体的存在本质的关联后,接着我要交代的是本书侧重的分析面向,以及采取这种分析立场的理由。整体而言,我希望这本书能给读者一个清晰的图像,那就是身体的生成是一个非常政治性的过程和结果。它不

〔1〕 虽然在当代的身体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分类和强调,甚至形成某种的对立性看法,但他们基本上都同意身体是一个文化社会与生物有机体的交合产物。见 Bryan S. Turner, *The Body and Society* (Newbury Park: Sage Publications, 1996 [1984]); Mike Featherstone, Mike Hepworth, and Bryan S. Turner, *The Body: Social Process and Cultural Theory* (Newbury Park: Sage Publications, 1991); Arthur W. Frank, "Bringing Bodies Back in: a Decade Review",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7 (1) (1990): 131 - 162; Chris Shilling, *The Body and Social Theory* (Newbury Park: Sage Publications, 1993); Anthony Synnott, *The Body Social: Symbolism, Self and Society* (N. Y.: Routledge, 1993)等的有关讨论。

是一个自发、天成、生物决定甚或个人意志反映的结果。虽然我们都拥有一个身体,而“我”的存在也源自于我的“身体”的事实存在,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可以,或经常掌握、主控身体的全部发展样貌。存在主义和现象学层次上的“我等同于我的身体”的声称,容或可以给予我们一个体悟身体触觉,以及意向性(intentionality)和生活世界建构的关联的思考,但这并不能去除身体的存在必然交杂着许多力量的同时存在,以及身体必须存在于一个特定的时间、空间场域的这个事实。这些牵涉着身体的生成,甚至外于身体而存在的客观力量,它们的实际存在和对身体所造成的影响,已经清楚说明意向性这个概念并不能用来解释身体生成的全部过程。在承认并严肃看待身体的生物性限制(如生老病死)和需求之后,我希望能以一个身体社会史(socio-historical study of body)的方式来探究和表现身体在近代中国的发展与变化。这个以建构论为基底的探讨方式,它的重点在于强调身体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它的发展和变化深受当下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环境的制约影响。这种多元、泛及于论述和非论述层次的深度浸透,不单对身体的生物性构成产生开发和指引的作用,同时也对身体的社会文化发展产生前导性的效果。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些建构身体成为一种主体载体的社会性力量,进行一个同时性与历时性的讨论,进而才能对这个主体的诞生有更适切的了解。

就像所有其他的社会研究一样,身体研究并不具有任何先验的标准可以作为探究的指引,或形成一个绝对正确的进路。这种寻找惟一正确的道路,在研究上是一个不必要的心理负担和欲想。在不能穷尽,也没有必要穷尽所有的面向才能对身体做一个深度、有趣探讨的情况下,我们所要努力的毋宁是对特定时空条件下所形成的特定身体形式,进行一个因果性的评论和分析。纵然这样的讨论在一些后现代史学者的眼中可能被视为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缩影,或一种文本衍生的结果,我们仍然不能放弃讨论和辩诘是认识世界最有利的方式的这个立场。空洞的怀疑主义或虚无主义立

场并不能真正为人的存在以及身体的解放找到松脱的出路。在这种体认下,我以四个攸关身体生成的基本面向来检讨近代中国的身体发展趋向。我希望透过这个讨论显露身体在中国的特定与局限发展,以及这种发展所造就的“合法”危险。这四个面向分别是身体的国家化和使命化开展,身体的法权化发展,身体的时间化走向,以及身体的空间化展演。我无意宣称这个讨论的整全性,也无意将其视为是研究身体的惟一正确进路,这四个分析面向本身包含的高度选择性已经否定这两种可能性。我所期望完成的只是在解剖身体在近代中国所遭遇的过度政治性支配,以及这种支配所以产生的原因和过程。这种讨论并不否定我们的确还可以从其他的面向或活动,如宗教、礼仪、性别、思想、育婴、人口或公共卫生等,来检视身体的建构与生成。

为了适切显示这四个面向的确对近代中国的身体产生深远的影响,我将采取一种年鉴史学所谓的趋势(conjuncture)的视角,来检证这一系列的身体开展过程。这种为时三十到五十年的历史发展趋势,将较短暂的事件史更能提供我们一个观测身体发展的基础视野,同时也能超越偶发性(contingency)可能造成的判断失误〔1〕。我将以1895年到1930年代的政治、社会发展作为主要的时间轴向,在必要的时候回溯到1860年代,来讨论身体发展状况。我希望透过时间的拉长以及事件之间的细微关联,来凸显身体在当时所经历的绵延变化。至于在分析角度的抉选上,我将以宏观(macro)的方式来观察和分析身体在这四个面向上的发展,微观(micro)部分由于必须落实在个别身体及其行动的细部观察上,为了维持书中立论层次的一致,我将不在本书中议及这个部分。

〔1〕 有关趋势的界定,以及年鉴史学对研究时间的特定划分,见 Fernand Braudel, *On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pp. 28-30, 74-75) 的讨论。

身体的社会学思索

身体成为社会学关注的焦点,当和其他众多议题,如宗教、生产、分工、组织、阶层和政治支配等作一比较时,是一个为时甚短的新起研究领域。在1980年以前,除了戈夫曼(Goffman)和埃里亚斯(Elias)等人曾以个体身体的社会展演,以及身体礼仪的文明进展作为讨论外,几乎没有什么重要的社会学著作是以身体作为深度探讨的对象^[1]。古典三大家: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虽然各有旷世的巨著讨论人类的文明发展和相应而起的生存困顿,但身体在他们的讨论中大半是以隐而不显的方式存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非人性化发展的批判,和其显露的人作为一种“类存在”(species being)在这种生产体系中所经历的危厄,以及对异化(alienation)问题的关注等,都显示一种生产性身体的存在,以及这种身体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所正经历的艰难发展。涂尔干对社会分工发展的探讨,对集体意识的讲究,和对“个体崇拜”(cult of the individual)的看重等,也都和身体的发展脱离不了关系。甚至在涂尔干有关人性二元论的讨论中,我们也可以清晰发现他的身体观和古希腊哲学、基督教传统以及笛卡儿的身/心二元论立场有高度的传承关联。他将身体视为是一个短暂、世俗、充满肉欲危险的生物机体,是一切私心的出发点;而相对应于身体存在的则是一个职司精神活动的神圣灵魂,它主掌着一切概念的活动以及道德教化的发展,这两者之间经常处于一种矛盾、对立和拉锯的发展。这种将身体视为是一个非理性、充满激情、情绪和欲望的场

[1] 见 Erving Goffman, *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8);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9); Norbert Elias, *The Civilizing Process, Vol. 1: The History of Manner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78); *The Court Societ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3) 的有关讨论。

域,必须受到心灵无时无刻的节制,否则便会酿成社会灾害的看法,其实是一种希腊哲学、基督教传统和笛卡儿身体观在 20 世纪初叶的翻版〔1〕。这种将身体与心灵一分为二的做法,也影响着韦伯对西方历史发展的观察与探讨。例如,韦伯对新教禁欲伦理的讨论,对理性化发展的焦虑,以及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所包含的理性计算和组织的检讨,就明白表露身体可能具有的危险性,以及整个西方文化发展所以走上科层化和理性化的根本缘由。这些不约而同的讨论,虽然都不是以身体的显性存在作为讨论的基架,但它们的议论都显示身体正在经历一个“文明化”的洗炼和约束,身体并不是存在于一个社会或历史的真空中发展。身体的建构、形成、发展和价值认定,与这些历史性力量的发挥与再生产有着紧密的关联。

到了 1980 年代初期后,由于女性主义对父权化社会和身体建构的批评与质疑,以及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高涨和文化工业的极度发展,导致身体成为一个消费商品的战场,身体在社会学领域中的重要性 with 能见度因而获得大幅提升。除了这两个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激发因素是福柯作品的问世。这个以规训权力(disciplinary power)作为探讨主轴,以全景敞视式的圆形监狱作为类比的分析基调,将隐含在人类社会中的身体规训机制和策略方案,做了一次全面性的清算。从人文社会科学中的论述建构,医疗院所中的诊疗对待,到刑罚体系的变更发展和同性恋的禁制发展,福柯以生命权力的概念对隐藏在身体四周的规训技艺,以及因为这些外在技艺的无所不在与内化而形成的一种自体看管技艺

〔1〕 Anthony Synnott 曾对这个源远流长的身体观进行过整理与讨论,有兴趣的读者请径阅氏著的 *The Body Social: Symbolism, Self and Society* (N. Y.: Routledge, 1993)。涂尔干的有关讨论,请见 Emile Durkheim, “The Dualism of Human Nature and its Social Conditions”, 辑于 *On Morality and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 pp. 149 - 163。